

海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Bronze Age of Haidai Area

方辉 著

山东大学
东方考古
研究书系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Bronze Age of Haidai Area



山东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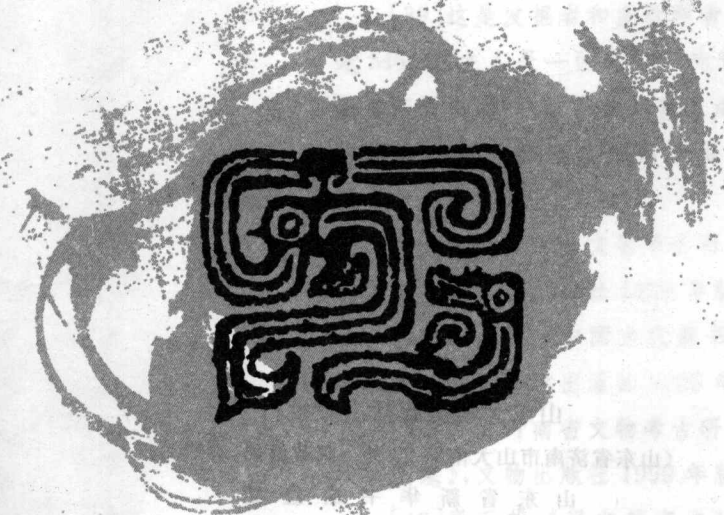
海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

方辉 著



山东大学
东方考古
研究书系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Bronze Age of Haidai Area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方辉著.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7-5607-3345-6

I. 海...

II. 方...

III. 青铜时代文化—山东省—文集

IV. K871.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1773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华鑫天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680×980 毫米 1/16 31.5 印张 393 千字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文集,大部分是作者从以往发表的文章中选出的,也有几篇是最近的新作,未曾或尚未见诸它处。已经刊发过的文章中,有少数几篇曾经在港台发表,此次是首次印行简体字版。

选入本书的文章,从年代上来讲,跨越了龙山时代晚期到东周时期两千多年的时间,基本上涵盖了我国的青铜时代;从地域上来讲,则是以海岱地区为主,同时兼顾了与海岱地区在地域上或文化上有密切联系的邻近地区。如果按照学科内部通行的做法,文集中的三十余篇文字可以划分为龙山、岳石、商和周四个时代,可以说它们是二十年来笔者在山东大学从事考古教学与科研路径上足迹的见证。

第一部分以龙山时代为主的一组文章完成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十几年间,是作者在邹平丁公遗址和日照地区从事聚落形态考察的心得。其中,有的是对聚落考古所做的理论思考和方法论探索,有的则是在丁公龙山陶文出土后不久所进行的思考。丁公陶文自 1992 年公布以来,有不少研究者发表过意见,但所根据的资料主要是不同版本的照片,或者根据照片所做的临摹。本书首次公布了根据实物所做的摹本,在准确性上超过以往版本,希望有助于陶文的释读。

第二部分是一组关于岳石文化的文章,涉及到岳石文化





的年代分期、区域类型和族属等问题。这组文章虽然大多完成于十多年以前,但由于近十余年来有关岳石文化的考古资料积累有限,文章的大部分观点对于笔者来说至今仍然有保留的价值。笔者所期待的,是学术界对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予以更多地关注,尤其是能够借助于人类学理论中关于族群认同与物质文化乃至体质特征关系的论述,超越长期以来考古学界浓重、单纯的“证史”倾向,对岳石文化乃至三代不同时空范围的考古学文化及其创造者予以多方位解读,以期获得符合实际的结论。

第三组则是商代考古部分,本组的若干篇文章大多完成于2003年济南大辛庄遗址发掘前后的最近几年。山东地区商代考古虽然起步较早,但只是到了最近的二十年间,以20世纪80年代济南大辛庄和鲁南若干遗址考古发掘为契机,本地区商文化的时空框架才得以建立,而半岛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的初步揭示,不过是近十年间的事。至于泰沂山腹地和鲁东南沿海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的面貌,至今仍然是未解之谜。本组文章的一个重点,是结合甲骨文、金文、历史文献和考古现象,围绕着商王朝与东方的关系展开论述的。

第四组以周代考古为主,尤其以周代青铜器为研究对象,其中有若干篇文章与笔者参加发掘的济南长清仙人台郭国墓地有关。青铜器研究向来以年代学和古国史为主要内容,本次选入的有关东周兵器和郭国史的两篇文章,就属此类。同时,笔者也试图从“性别考古”的角度,对青铜器用方面的男女之别加以考察,有关周代方座形铜器和铜匜两文,就是初步尝试。由于这些文章是在不同时代发表在不同的杂志上,体例有所不同,收录本文集时在体例上进行了统一。

本书的出版与其说是作者学术道路上的一个总结,不如说是一个新阶段的开端。学无止境,愿以此四字与大家共勉!

作者谨识

2007年3月22日

目录

- 001 对区域系统调查法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 019 日照两城地区聚落考古:人口问题
- 026 研究人口迁移的新方法
——锶同位素分析技术
- 029 关于丁公龙山陶文的几个问题
- 034 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多字陶文
- 042 海岱地区早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
- 053 东北地区出土绿松石器研究
- 073 凌家滩出土“玉人头像饰”应为玉质钺帽饰
- 077 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
- 095 谈岳石文化的几个问题
- 106 岳石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137 岳石文化区域类型新论
- 170 浅谈岳石文化的来源及族属问题
- 194 岳石文化衰落原因蠡测
- 207 “南关外期”先商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对夏商文化
断限的启示

221	“景亳之会”的考古学观察
231	岳石文化与夏商文化
244	论郑州商城
260	山东商代考古的历史回顾
269	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的新收获
283	大辛庄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294	大辛庄甲骨文的几个问题
301	记两件流失海外的大辛庄出土商代青铜器
308	商王朝对东方的经略
324	商周时期鲁北地区海盐业的考古学研究
357	从考古发现谈商代末年的征夷方
384	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制品及相关问题研究
404	商代螺钿漆器浅说
	——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蚌片兽面”谈起
413	商周时代的青铜面具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
425	寺公典盘铭考释
430	寺公典盘铭与郛史再考
440	春秋时期方座形铜器的定名与用途
453	邹城、平度出土的吴王夫差青铜剑
458	“九年京命戈”考
462	记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画像青铜壶
478	山东省博物馆藏裸人铜方鼎
483	试论周代的铜匱

对区域系统调查法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区域系统调查(Regional Systematic Survey),又称为“全覆盖式调查”(Full-Coverage Survey),是以聚落形态研究为目的的考古调查方法。它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美洲,随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受其影响,我国学者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在小范围尝试这一调查方法,并取得一定成功^[1]。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大学和研究机构通过与外国同行合作,先后在山东日照^[2]、河南巩义^[3]、内蒙古赤峰^[4]、河南安阳^[5]和河南灵宝^[6]等地开展了规模大小不一的区域系统调查,发表了阶段性成果,初步显示了这种调查方法在我国考古实践中所具有的发展潜力。

自 1995 年以来,笔者参加了山东日照地区的总共 6 个季度的调查。在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实际工作中,对区域系统调查法及其学术意义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对于如何在我国试行和推广这一方法,也进行了一些思考。现略陈己见,以就教于学界。

一、区域系统调查法发展简史

区域系统调查是考古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可以说是与聚落考古发展同步的。它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





美洲。当时,科学的考古学在美洲已经有了 40 多年的历史,各主要地区的年代学已建立并完善起来,考古学研究出现了新趋势。聚落考古就是这诸多新趋势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种^[7]。

区域系统调查是聚落考古的必经步骤。20 世纪 40 年代戈登·威利在秘鲁维鲁河谷的区域调查,揭开了聚落考古的序幕。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外,考古学家在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起源较早的地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墨西哥高地和爱琴海地区以及美国西南部,先后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系统调查,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考古学的发展和文明起源的研究。1985 年,全美考古学会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开会,就区域系统调查的理论、方法及其在世界各主要地区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研讨,会后出版了《区域考古研究:区域系统调查例》一书。大家认为,区域系统调查不但为聚落形态的变迁,而且通过遗址的等级状分布、遗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聚落中心的转移等现象,为进一步考察特定区域内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过程提供必要的依据,其成绩应予以充分肯定^[8]。这标志着区域系统调查法已经处于成熟阶段。

在上述几个地区的系统调查中,尤以墨西哥高地持续多年的大规模的系统调查最为引人注目。这项调查包括墨西哥盆地和奥沙卡谷地两个区域。仅以后者而论,通过 30 余年对区域内逐个地块的徒步调查,考古学家的足迹遍及 5000 多平方公里,对整个奥沙卡谷地和大半个墨西哥盆地上自公元前 500 年、下至公元 16 世纪初叶西班牙人入侵,历时 2000 多年、共 11 个历史阶段聚落形态的变迁情况,有了具体了解^[9]。目前,学者们研究的焦点聚集在引起聚落形态变化的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原因等方面,并已经取得了一批令人信服的成果^[10]。

与单纯的以发现考古遗址为目的的传统调查方法不同,区域系统调查法强调的是对特定区域内不同时期、不同文化



阶段之间聚落形态的变化过程进行动态的观察和研究。因此,随着聚落考古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和发展,区域系统调查法也逐渐受到世界各地考古学家的重视。可以说,区域系统调查法已经成为聚落考古和聚落形态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开展区域系统调查较早的地区同时也是聚落考古最为成熟的地区,它们大多已经有综合性的成果问世,正处于收获的季节。

在我国考古基础较好的地区,随着考古学文化谱系和时空框架的建立和完善,区域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到 90 年代前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考古学类型之下“小区”概念的出现,实际上正是在区域研究条件日趋成熟的情况下提出的。在这种背景下,少数学者结合自身的课题,围绕大遗址(群)制订并实施了小范围的系统调查,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文提到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的系统调查。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那种有目的地围绕一个中心遗址而开展的大规模的区域系统调查才在我国北方地区正式开展起来,像上文提到的山东、河南和内蒙古等地的调查就属此类。这些调查大多是国际间的合作项目,技术手段比较成熟,投入的资金也相对宽余,这就保证了调查的连续性。因此,这些调查所覆盖的面积普遍较大,一般都在 100 平方公里以上,甚至达到数百平方公里,而且每年仍然以数十平方公里的面积向四周扩展。可以预见,在如此大规模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上述地区的聚落考古和聚落形态研究将会在近几年内取得突破。

二、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

在区域系统调查法出现以前,国外的考古调查曾经历了一个被他们称之为“抽样调查法”(Sampling Survey)的传统阶段。“抽样法”人为地界定出重要与非重要的地块,缺少系统性与全面性。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规模较大的遗址,并能



为单个遗址的发掘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往往遗漏非常重要的遗址和信息。甚至像墨西哥提奥底华坎这样重要的遗址,竟然也会被忽略了,考古学家称之为“梯奥底华坎现象”(Teotihuacan Effect),以示警戒^[11]。抽样式调查法的这种非系统性,也决定了它不可能为聚落考古和聚落形态研究提供客观的遗址分布方面的信息,而全覆盖式的区域系统调查法,则可以满足上述要求。

那么,如何理解区域系统调查法的“系统性”或全覆盖式调查法的“全覆盖”这些概念?以我的理解,这里的“全覆盖”和“系统性”,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野外调查,覆盖的面积要全面、系统;二是指记录的系统性(包括地图的和文字的系统性)。对于调查的方法,过去我们曾作过介绍^[12],国内的其他学者也曾有过论述,但均嫌过于笼统^[13]。以下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谈谈其具体操作步骤。

在调查开始前,首先要确定的自然是研究的区域。这样的区域可以是一条或几条河的流域,也可以是一个盆地。重要的是这样的区域应该要有比较好的考古学基础,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文化分期比较清楚。这是开展调查和研究的基础。研究区域一旦确定,就可以选择一处已知的较大规模的遗址,并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扩展调查的范围。一般说来,在考古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这样的遗址是不难找到的。

调查所需的设备和工具,主要有照相机、指南针、地图和手铲等,必要时还可配以探铲。如需测量遗址准确的经纬度,还要配备全球定位仪(GPS)。地图的选用非常关键。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以比例尺为1:10000以上的地图最为合适。凡是调查过的地块,都要及时在地图上作出标记,以免遗漏或重复。

野外调查是关键,因为调查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记录的准确性,并会影响到将来综合分析和研究的结果。因



此,调查人员的组成,要选择对陶片有较高断代能力的专业人员,或队内至少有一至两名具有这种能力的专家。人员的组成以5~7人为宜。调查时,队员以30~50米的间隔呈“一”字形或“V”字形排开,中间一人为持地图者。队员在规定的路线上,沿直线前行;当间隔超过50米时,则以“之”字形路线前进。持图者除了记录自己所发现的遗存外,还要时刻注意其他队员所在的位置,并记录他们的发现。队员一有发现,要及时通知持图者,以便在地图上记录下发现者的所在位置。这时,相邻队员要协助发现者确定遗址的范围。到达调查线路的终点时,持图者要及时在地图上记录下每位队员所获得的信息,包括遗物(主要是陶片)所属年代和分布范围等。

采集和记录的对象包括地表所能发现的所有遗存,包括陶片、石器、石器等遗物和文化层、灰坑、墓葬、城墙等遗迹现象。遗址的范围和时代也是根据这些遗存来确定的。这一点同传统的调查方法是基本一致的。与传统方法不同的是,遗址的范围不是根据文化层的分布来确定,甚至也不是根据遗址的隆起程度来确定,而是根据陶片等遗物的分布来确定的。而记录的方法与传统方式更是有所不同。因为调查的结果最终都要落实到地图上,新方法尤其强调地图记录的准确性。每位队员的调查路线是事先在地图上确定好了的,因此,有几位队员,实际上就有几条采集区,也就有几个可供记录的区域。每个采集区的采集标本要单独放在一种特制的带有防水标签的小布口袋中,并写明遗址代号、分区号、采集人姓名和日期等。采集品的文化属性和具体年代,可留待室内整理时来最终确定。采用这种分区记录方式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对于那些多个文化(期)共存的遗址,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每一文化(期)遗存实际分布的区域。

室内整理主要是分析标本所属的文化、时代和具体期别,并将不同文化、不同期别的遗址范围分别落到地图上。



一般说来,有几个文化或文化期,就有几幅聚落分布图,从而既可以从横的层面上了解不同文化乃至不同文化期遗址的分布情况,也能够从纵的方面考察该地区从早到晚聚落形态历时的发展演变。为了便于考察聚落与聚落、聚落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聚落分布图要标出河流、山丘等明显的地理标志。

以上所谈,只是区域系统调查的一般步骤。从理论上讲,只要地理条件许可,调查范围可向四周无限地扩大。不难设想,有限的调查面积是不利于观察遗址群之间的关系。调查的面积越大,越有益于透露出诸如集团的活动范围、集团之间的边界和交通路线等方面的信息。区域系统调查只是聚落考古的第一步,研究者只有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并结合对地理、资源和贸易等多方面的综合考察,才能最终复原出人类集团的行为和社会组织演进的过程。

三、在我国开展区域系统调查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如上所述,在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中,一切关于聚落和聚落形态的信息都是基于采集物、尤其是陶片的性质和年代而定的。因此,完善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器物类型学研究是开展系统调查的基础。年代序列越清楚,陶器分期越详细,越有助于考察聚落形态变迁的动态过程。

如果从 1926 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算起,我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路程,尤其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我国主要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已陆续建立并完善起来,这就使我们的一切综合性研究有了可靠的年代学标尺。在这样的地区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应该说条件已经成熟。另外,与传统的抽样式调查方法相比,区域系统调查法可以为考古学者提供更加广泛、更加丰富的采集品。它不但可以使我们在界定遗址的



年代和性质时更加准确,而且还有助于发现有关考古学文化和文化期别之间业已存在的缺环等方面的信息,从而通过有目的的发掘,完善已有的年代序列。

这里可以日照地区的考古调查为例。根据以往考古工作的经验,包括日照地区在内的鲁东南地区史前至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是: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文化→周文化→汉文化。但对于当地商代文化的面貌,尚缺乏必要的了解。十几年前,笔者曾推测这里的商代文化属于土著性质,文化面貌大约与半岛地区的珍珠门类型相似^[14]。然而究竟如何,由于缺乏发掘资料,终未有结果。这次的区域系统调查,我们在几个遗址中发现了这类遗存,其陶器带有浓厚的岳石文化遗风,应该就是当地商代至西周早期文化的遗存。由此可见,区域系统调查虽然以编年学为基础,但反过来又有助于完善已有的考古年代序列。

考古学文化编年是开展区域系统调查的年代学基础。除此之外,这种调查对地理地貌还有一个基本要求,即地貌条件应允许采集品暴露于地表并易于被发现。幸运的是,在我国,考古学基础较好的地区恰恰多属于农耕区,遗址中的包含物很容易随着农业生产活动暴露在地表上,从而为调查者所发现。就是说,除了南方水乡和华北局部的黄泛区个别地区以外,区域系统调查法在我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调查方法简单易行,只需对有关人员作适当的培训即可胜任。而且,并不需要很大的花费。只要持之以恒,就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理想效果。

以上是就可行性而言。实际上,考古工作者在山东、内蒙古、河南和湖北等地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查方法。其直接的效果,除了上面提到的有助于完善文化谱系与编年以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最直接的效果表现在调查所发现遗址的绝对数量上。与传统的抽样式调查法相比,区域系统调查因为采用

“全覆盖”或“拉网式”的调查方法,发现遗址的概率比前者自然要大得多。例如,我们在日照两城镇地区前两个季度的系统调查中,调查面积为 96 平方公里,发现并记录了 152 个遗址。而在此前当地进行的文物普查中,只发现过其中最大的两处遗址,即两城镇和丹土^[15]。截至 2000 年,我们围绕着两城镇遗址共进行了五个季度的调查,调查面积达到 400 余平方公里,发现和记录的遗址在 400 处以上,其中 80% 以上的遗址是我们在调查中新发现的^[16]。又如,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区域调查项目,涵盖面积为 200 平方公里,共发现并记录了 200 余处遗址,其中只有 20 处是以前发现的^[17]。就是在“田野调查工作最密集、最扎实可靠的”河南省巩义市,考古工作者在约 50 平方公里的调查范围内,调查的遗址共 30 处,其中三分之一是通过系统调查新发现的^[18]。由此可见,无论是考古工作基础较好的中原地区,还是工作相对较为薄弱的周边地区,区域系统调查法在对未知遗址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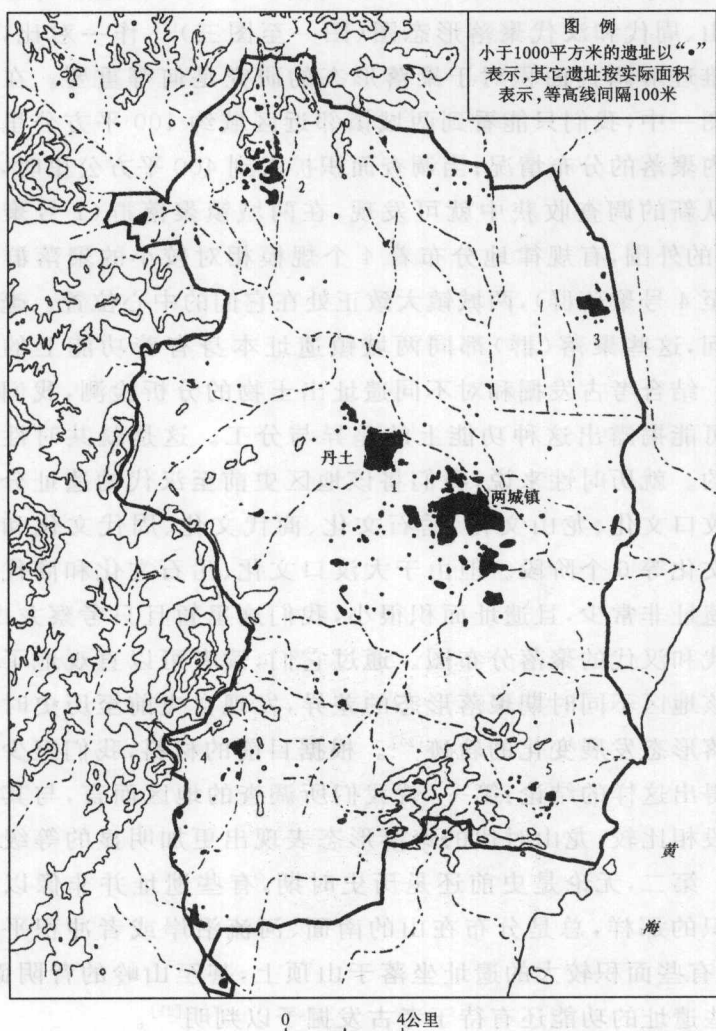
第二,便于确定遗址的范围、考察不同时代遗迹的种类和分布情况等。这是就大遗址或中心遗址而言的。例如,通过对两城镇遗址的系统调查,我们不但得知两城镇遗址的总面积比以往认识的要大出许多,而且,两城镇在龙山、周代和汉代几个不同时期,遗址的规模也相差很大。就是在龙山时代不同期别之间,遗址规模差别也是很大的。又如,通过对石家河周围约 8 平方公里的调查,使我们对于石家河遗址群的分布、空间结构、功能结构和兴衰过程等有了全新的理解(尽管从聚落形态研究的角度来看,调查面积尚嫌过小)。

第三,区域系统调查法的优势,更主要的是体现在聚落形态的研究上。这样的研究无非是包括横向的(共时型)和纵向的(历时型)两个方面。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调查效果与调查的面积都成正比。调查面积越大,所获得的有关聚落形态方面的信息自然也就越多。仍以日照两城镇地区的调



查为例,大家只要把前两个季度与前五个季度调查所得到的龙山、周代和汉代聚落形态图(图一至图三)^[19]作一对比,便不难理解调查面积对于聚落形态的研究是何等重要。在本文图一中,我们只能看到两城镇邻近区域约 100 平方公里范围内聚落的分布情况;当调查面积扩大到 400 平方公里时,我们从新的调查收获中就可发现,在两城镇聚落群(1 号聚落群)的外围,有规律地分布着 4 个规模相对较小的聚落群(2 号至 4 号聚落群),两城镇大致正处在它们的中心位置。毫无疑问,这些聚落(群)都同两城镇遗址本身有着功能上的联系。结合考古发掘和对不同遗址出土物的分析检测,我们将有可能揭露出这种功能上的差异与分工。这是就共时性而言的。就历时性来说,我们将该地区史前至汉代的遗址分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文化、周代文化和汉代文化等 6 个阶段。但由于大汶口文化、岳石文化和商代文化遗址非常少,且遗址面积很小,我们这里暂且只考察龙山、周代和汉代的聚落分布图。通过它们,读者可以直观地了解到该地区不同时期聚落形态的差异,发现自史前至历史时期聚落形态发展变化的轨迹^[20]。根据目前的材料,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就我们所调查的地区而言,与其他阶段相比较,龙山时代的聚落形态表现出更加明显的等级分布。第二,无论是史前还是历史时期,有些遗址并非像以往认识的那样,总是分布在山的南面、河流沿岸或者冲积平原上,有些面积较大的遗址坐落于山顶上,甚至山岭的背阴面。这些遗址的功能还有待于考古发掘予以判明^[21]。

由此可见,作为聚落考古研究的第一步,区域系统调查能够为我们提供传统方法所不能获得的考古信息。这些信息不只是表现在发现遗址的数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探索和理解所在区域内聚落形态变化的动态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这一过程背后所蕴含着的人口、社会、资源、贸易和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图一 龙山时代聚落分布图

1. 核心聚落群 2~5. 小聚落群